

台湾

「民主政治」 透视

汪澍 洪伟 艾克 / 主编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C14034031

D675.8
60

台湾



「民主政治」 透视

汪澍
洪伟
艾克 / 主编



北航

C1722189

D675.8
60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湾“民主政治”透视 / 汪澍, 洪伟, 艾克编.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80252-502-3

I. ①台… II. ①汪… ②洪… ③艾… III. ①民主政治—研究—台湾省 IV. ①D6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8818号

台湾“民主政治”透视

主 编: 汪澍 洪伟 艾克
责任编辑: 陈娜娜
装帧设计: 姚 洁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海泰大厦10层
电 话: 010-82885151
邮 编: 100083
电子信箱: huayip@vip.sina.com
网 站: www.huayicbs.com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178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4年3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2-502-3
定 价: 36.00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台湾威权政治转型、政治革新及其困境	1
一、“台湾民主”打造出一个什么样板?	1
二、台湾威权政体面临挑战	2
三、台湾政治转型中的“蒋经国因素”	11
四、台湾政治革新中的“李登辉背离”	20
五、“普力夺”特征与政治动荡	26
第二章 美日因素、依附政治与“务实外交”中的“民主牌”	37
一、马英九在感谢谁?	37
二、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	38
三、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日本因素	51
四、依附政治、岛民心态与民主瓶颈	61
五、台湾“务实外交”中的“民主牌”	70
第三章 台湾选举制度设计与“选举主义”陷阱	79
一、对选举的过度崇拜	79
二、台湾政治文化视野下的选举制度	81
三、台湾选举制度的演变及缺陷	89
四、台湾选举主义透视	96

.....◆ 台湾“民主政治”透视

五、非理性选举的恶俗	101
六、“选举主义”导致的政治经济后果	113
七、台湾选举制度改革何去何从?	119

第四章 台湾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与民主乱源

一、台湾“宪政体制”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125
二、台湾政党体制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140
三、台湾文宣制度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148

第五章 台湾“民主政治”的营销理念与民主异质化

一、“肉桶政治”真是难看	163
二、民粹政治的营销与异化	165
三、娱乐政治“戏化”民主	176
四、媒体失重诱发的民主异化	189

后记

204

第一章 台湾威权政治转型、 政治革新及其困境

一、“台湾民主”打造出一个什么样板？

说起政治的革新与转型，台湾人记住了这样一个日子：1985年12月25日。就在这一天，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在一次会议上突然脱离讲稿，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

这看似只涉及一个家庭——“蒋家”的决定，实际上意味着蒋氏“家天下”在台湾的完结，台湾真正进入了一个重大的政治转型期。

其实，在蒋介石去世之后不久，1977年发生的“中坜事件”和1979年发生的“美丽岛事件”，就已经预示着台湾社会改变了以往一味追求经济建设的道路，涌动着呼吁政治革新、追求“民主政治”的潮流。

台湾地区这个潮流的涌动，并不是孤立的事，而是当时正在席卷全球的两股浪潮下产生的一种“天下大势”，一种“人心所向”。这两股浪潮，一股叫“经济的市场化浪潮”，一股叫“政治的民主化浪潮”。经济市场化的浪潮促使着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一些经济体迈向改革与开放，形成了新的气象，一派生机盎然。正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岛内本土势力上升及政治思潮形成的压力，蒋经国认识到只有持续发展经济、建立更开放的社会，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才能继续维持。于

是，国民党当局决定“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进行“中央”民意代表及机构改革、举行“省市市长”选举、解除“戒严”、开放民间组党等。这，意味着国民党将进行一次政治转型。

但是，并没有像台湾当局所想象的那样——政治一革新，政体一转型，就把台湾打造成西方式民主的亚洲样板了。台湾“民主政治”的转型中，始终问题重重。所谓的台湾“民主政治”似乎依旧停滞于碎片式、畸形化的表现样式，派系争斗、族群撕裂，你争我夺，“普力夺”式（在制度化程度低而参与程度高的政治体制内，社会力量借助它们各自的方式直接在政治领域里进行活动的政治体制）政治生态凸显。就如学者所言：“台湾‘民主’向着劣质化发展”。加之，“台独”势力导致民主严重异化，异化的“民主”反过来又成就了“台独”势力，蓝绿两个阵营的纷争，成为台湾政治转型之后伴生而来的“顽症”。一个时期以来，台湾已经为政党恶斗和民主异化付出了惨痛代价。社会阵营分裂，社会生活政治化，经济与民生不再是政客们关心的真正重点，使得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停滞，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出现“自我边缘化”的迹象。

如果一定要说“台湾民主”打造出一个什么样板的话，那应该是一个“普力夺”式的政治生态的样板，一个让你一眼能见的你争我夺、纷乱至极的“夹生民主生态”的样板，而绝非是“成熟的民主”的样板。一句话，“台湾民主”远非可以以“灯塔”自居、以“典型”自守。

二、台湾威权政体面临挑战

那么，如何考察台湾政治革新与转型的缘起呢？这还得从国民党退居台湾时所选择的“威权政体”说起。

所谓威权政体，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介于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较为温和的专制政体。威权政体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南欧国家。这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依靠一个“政治强人”组

建政府，对社会事务实行较多控制，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作为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有自由投票体制但不鼓励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多元化。至20世纪60、70年代，东亚和拉美地区众多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威权政体作为推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威权政体俨然成为战后的主流。

应当说，威权统治给台湾地区战后的经济恢复发挥了制度性的效用。二战以后，国民党败退，蒋介石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矢志于经济建设，以图东山再起。蒋经国时期，台湾当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稳定、发展”的经济政策，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兼顾出口导向工业，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发展。1961年至1988年间，台湾年均经济增长率达9.3%，基本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成为令人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

然而，随着台湾经济社会的快速现代化，被威权政体长期压抑的民众也要求更大的政治参与权利，反过来就对威权提出了挑战。民众迫切要求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舆论，推行政治改革，实现民主政治。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何去何从？是向民主化转型，还是坚持威权政体？是开放舆论，还是继续国民党一党专政严控舆论？这是摆在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命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环境风云变幻以及台湾经济增长带来的阶级、阶层结构的重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从威权政体到政治多元化的转型，似乎已经水到渠成，呼之欲出。

那么，从蒋介石到蒋经国，威权政体是怎样逐步走向瓦解的呢？有人对此做了个“很文艺”的比喻：“中华民国的党国体制，如果是一块铁板，难免有用铁量不足的地方且容易生锈，则被腐蚀开了天窗；如果是一块顽石，而顽石本身则有天生的裂缝存在，所以野草在石缝成长，开出民主之花。”

这里所说的“锈蚀”与“裂缝”，归结起来，其实就是影响台湾政治转型的几个方面背景因素：

(一) 中产阶级的形成

经济的高速增长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是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渐减少，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步提高。据统计，台湾农业人口从1952年的52.4%，逐年下降到1989年的18.1%。农业和工业在“国内生产净值”中的比例从1952年的30%比18%变为1987年的6.2%比47.1%。台湾经济结构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二是经济体系中不同经济成分的地位作用发生改变。由于台湾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蓬勃发展，民营资本在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由1952年的43.4%增至80.2%，同时公营资本的比率却从56.6%下降到19.8%。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台湾的中产阶级。

据台湾“主计处”1987年调查显示，台湾的中产阶级约占台湾所有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一。而根据“行政院”经建会《人力资源统计年报》和台湾学者的分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新兴中产阶级已占到就业人口的30%左右。尽管统计的口径不一，但不容置疑的是中产阶级的异军突起。主要包括为受雇的行政及主管人员、企业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医师、律师、会计师和文艺工作者）、中小企业家，年龄在三四十岁之间者居多，大都受过大专以上程度教育，2/3在非公共部门从业，收入也较高。

中产阶级既在经济现代化崛起中扮演重要角色，又在民主政治进程中作为主要推动力量。从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到十九世纪的托克维尔，古典民主理论学者都认为，民主政治多半产生于中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地区。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巴克顿·摩尔则言简意赅地指出：“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就整体民主意识而言，台湾中产阶级与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并无不同，只是因为省籍差异而在政党支持上存在着分野。一部分中产阶级倾向于从事或支持“体制外”的反对运动，成为威权政体的重要“压力”

来源；另一部分中产阶级则要求国民党进行“体制内”的政治革新，他们的民主理念和对执政党的政治支持，使执政党在政治改革过程中有了力量的支持，因而形成政治转型的“引力”。在支持反对威权政体运动的中产阶级当中，知识分子与中小企业家是其中坚力量。知识分子是反对运动的领导者与策划者；中小企业家则具备投入政治活动的财力，也以其个人财富为反对势力提供政治基金与可作为退路的职业。

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就业人口的大幅变动，以及中产阶级的快速崛起，强烈地冲击着国民党的威权政体，政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落后的上层建筑已经不能适应已经发生变化的经济基础。从这种意义上看，台湾的政治转型归根到底是经济基础发展的结果。

（二）“党外势力”的挑战

在1988年以前，由于台湾实行“党禁”，除国民党以及从大陆迁台的民社党、青年党外，不准成立新的政党，一切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政治力量都被统一称为“党外势力”。“党外势力”作为国民党以外的其他各股力量构成的政治力量，自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就一直存在，但以前由于国民党严厉打压，“党外势力”发展空间相当有限。但时至20世纪70年代，伴随经济发展，台湾中产阶级日益壮大。为了保护自身经济利益，他们迫切要求在政治上掌控话语权，以改变“纳税有份，参政无份”的现状，由此汇聚成一股强大的与国民党当局对立的“党外势力”，并迅速崛起为台湾政坛上的一支生力军。不断高涨的党外反对运动也就成为了台湾政治转型的内在压力。

1. “党外势力”挑战原有政权合时性

“党外势力”对国民党当局的挑战，实质是对威权政体下的统治合时性（非真正意义上合法性）的挑战。与西方国家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其成立过程的合法性有所不同，威权政体的合法性（主要是合时性）主要来自政治领袖的个人威望和政府的施政绩效。于是，“党外势力”对国民党当局

的挑战也就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执政者的政绩挑战，这里并不是说蒋家父子治理台湾没有政绩，而是在一个民主化的浪潮冲击下，一种意识已经产生：“你上台做事，是不是人民的意愿”，“你的权力是不是人民赋予的”，这关系到你的政绩、你的作为有无“合法的民意基础”。没有了这一点，其政绩的合法性也就存在明显局限性；另一个是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宣传的挑战。当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教育已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除了学校政治课教育外，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都贯穿着铺天盖地的三民主义教育。意识形态教育自然旨在强化统治的合法性，但“说教”与“渗透”手段的全面周到并不能代表其效果的显著。“威权下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威权统治本身一样”，其合时性（非真正意义上合法性）均面临理性的挑战，而且往往经不起理性的考量。

如此一来，“党外势力”的滋生暗长，并步步紧逼的挑战，也就招招击打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要害上，无疑动摇着其威权根基，迫使着蒋经国在容忍与压制上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显然，如果是一味镇压，只会徒增社会不安因素，且有损国际形象。倘若允许其进入制度化的竞争，也许可以将反对运动的力量和民间社会的要求纳入政治体系运作轨道之中，有利提升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

再三权衡，国民党当局选择了“政治革新”，但这毕竟是为巩固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而采取的被迫无奈之举，国民党肯定不允许一下子“让人全盘介入、全盘渗透”。于是，当时国民党采取了“封闭中央”与“开放地方”的政治策略。所谓“封闭中央”，是指中央级别的“国民代表大会”、“立法委员”不放开选举。所谓“开放地方”，是指中央以下级别，在台湾指（台）北高（雄）两地以外的县市，其所有公职人员均向地方开放，无论外省人士和本省人士，均可参加选举。国民党对地方的实质控制，是通过制定选举法和具体选举方案来操控人选。“开放地方，封闭中央”，是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台湾政权持续了20余年的“基本国策”。但20余年开放地方自治的结果，必然是民智——自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上

升。这种上升，也很自然地会对“封闭中央”，也就是台湾封闭的顶层民意机构，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未曾料到的是，国民党“封闭中央”的美梦，在不经意间造就了“地方包围中央”的政治态势，培植了政治发展的生长点和政治行为主体，最终成为了国民党威权政体的掘墓人。

2. “党外势力”的主要活动形式

当时，台湾“党外势力”反对运动形式主要有三种：

首先是创办政论性刊物。最活跃的“党外势力”刊物有《大学》杂志和《台湾政论》月刊。《大学》杂志创办于1968年，最初是一本文艺、教育类刊物。从1971年开始，《大学》杂志的编辑方针转变为以政论、社会评论为主。1971年1月，发表刘福增、张绍文、陈鼓应的“给蒋经国先生的信”，呼吁“政治革新”。10月，发表由杨国枢、张俊宏、高准、陈鼓应、许信良等15人联合撰写的“国是诤言”，从人权、经济、司法、立法等不同角度对台湾政治权力结构调整、政治革新、“国会”改选等进行探讨，在台湾社会造成巨大震动。1972年1月，发表“国是九论”，对台湾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进行系统批评，并对蒋经国倡导的“革新保台”提出建言。

一直以来，“党外势力”就是以这些政论刊物为阵地，批评国民党的威权统治，质疑台湾“国体”、“政体”和“法统”，并直接向民众喊话称“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根本的制度”等，在民众中造成巨大冲击力，直接动摇了台湾国民党威权政治的根基。

其次是参加竞选活动。积极参加各项选举，是“党外势力”同国民党斗争、壮大自身力量的主要手段，也是争取问政的重要管道。“党外势力”参与选举的方式，一个是参与“地方选举”，从底层瓦解国民党统治根基。另一个是“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从高层挤压国民党施政空间。按照台湾当局的规定，“台湾省主席”、“台北市市长”以上是不能选举的，但地方县长、市长以及县、市议员则由选举产生，“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所谓“中央民意代表”在保持从大陆当选的终身委员不动的情况下视遗

缺情况进行“增选”，这样既能粉饰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又能保证在人数上对“民意机构”绝对控制。

由于国民党占有政治、组织和资源上的优势，又操纵选举，而党外人士则多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因此在20世纪50—60年代，只有极少数非国民党人士在选举中取胜。70年代以后，“党外势力”改变了过去单打独斗的做法，参选人不仅有自己的助选团，还开始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在准备1978年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时，就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统一政治诉求、统一竞选口号、统一助选服务，声势空前。此举不仅使“党外势力”直接杀入“中央民意机构”与国民党较量的可能性加大，而且使其趁机壮大了自身力量，更使得这些“党外势力”找到了对抗国民党的有效手段。很快，“党外势力”就在1977年11月的“地方选举”中初战告捷，得票率超过30%，在个别地区甚至达到60%以上，4人当选县、市长，21人当选省“议员”。这次选举被视为“台湾政治气候转变的关键”，并使得这些“党外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政党的雏形，也为其后台湾反对党赢得选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再次是组织街头反对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爆发两起政治事件都与“党外势力的挑战”有关，是台湾“党外势力”直接领导的、与国民党当局展开的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政治较量。

一起是“中坜事件”。1977年11月19日，台湾当局举行台湾“省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及乡镇县辖“市民代”和“乡镇县辖市市长”等“五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时，参加桃园县中坜镇投票的选民，对国民党当局用金钱收买、警察干涉等手段控制选票，以保证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当选的舞弊行为极为不满。在部分“党外人士”带头下，上万群众包围了中坜镇警察分局，当场烧毁8辆警车、60辆双轮摩托车。国民党出动“镇暴队”，向选民开枪射击，打死1名大学生和1名工人，从而更加激怒了选民，他们当即放火焚烧了中坜镇“警察分局”。据当时的台报称，这是国民党去台后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以来所发生的规模较大的一次

政治性事件。这次事件彻底暴露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对台湾国民党威权政体的打击甚大。

另一起是“美丽岛事件”。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社以纪念“世界人权日”为由，在高雄组织2万多人集会，并在晚上举行游行，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国民党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进行镇压，并与游行民众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造成近200人受伤，酿成震惊海内外的“美丽岛事件”。之后，国民党当局开始大规模搜捕事件参与者，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等共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叛乱罪”被抓扣，聚集在《美丽岛》杂志周围的“党外势力”核心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美丽岛》杂志及其在各地的分支机构被查封。1980年，经过“军法审判”，以“为中共统战”和“台独叛乱”罪名，大多数被捕人员被判刑入狱。“美丽岛事件”虽使“党外势力”的活动受挫，但也使国民党的统治受到了严重挑战，并为后来“党外势力”的再起和反对党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中坜事件”和“美丽岛事件”等街头抗争虽然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强力镇压，但同时也让蒋经国看到了群众运动中蕴含的惊人能量。

（三）国际环境的挤压

1949年以后，美国在联合国操纵表决机器，一直以“延期审议”为名阻挠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力的问题，致使台湾当局得以非法窃踞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达20年之久。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罗马尼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力并驱逐台湾当局的提案。应当说，台湾地区在当时的国际处境已经是相当艰难。至1971年，已有65个国家与中国建交，而与台湾当局维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55个。更可悲的是，台湾一“退联”，就出现了“多米诺骨牌”

效应，几乎一夜之间，20多个国家与台湾当局“断交”。随后，一直作为台湾的“靠山”的日本、美国也相继与之“断交”，大有风雨交加，大厦将倾之势。

1972年6月，蒋经国以有史以来最高得票率出任“行政院长”，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台湾步入蒋经国时代。但新的领导人无法阻挡民主进步的历史车轮。也就是说，蒋经国主政时，国民党威权政体已经十分明显地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其主要表现：一是外在支持开始弱化。从1971年台湾被赶出联合国，到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和中日建交，台湾遭到一连串的“外交”挫败，在国际上日趋孤立。二是“内部合法性”也逐步衰退。大多数高层政治职位由占岛内人口少数的大陆籍人士独占，政治权利的分配不平等受到民众强烈质疑。

而此时，被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誉为“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正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地推进，世界民主化运动蓬勃发展使国民党威权统治更陷于困境。正如亨廷顿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书中所言：“20年前，世界上约有不足30%的国家是民主国家，现在，60%多的国家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公开、公平和竞争性的选举来建立政府的。”

紧接着，1986年3月，菲律宾“黄色革命”推翻了马科斯独裁政权的统治；1987年6月，持续不断的学生运动导致了韩国全斗焕政权的垮台，韩国开始向民主化过渡。台湾与韩国、菲律宾相邻，在“政权”结构、社会构成、内外环境各方面多有相似之处，这便产生了“某些威权政权的垮台对其他威权国家统治者和反对派的信心所起的雪崩效应”。所有的一切轮番冲击着国民党威权统治者的心理底线，让他们明白与其被势不可挡的民主化浪潮所掀翻，不如顺应潮流主动进行“政治革新”。

当然，那时候更有来自美国的幕后操纵和干预，对台湾民主化进程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台“断交”后，美国出于对亚太地区战略的考虑，认为一个“亲美反共”的民主政体要比一个“亲美反共”的威权政体更稳定可靠，更能维护美国利益。基于此，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开始大刀阔斧地

推动台湾政治体制由“军事戒严”、“一党专政”向西方政党制度过渡，力图“形成一种‘以独制蒋、以蒋制共、以共制苏’的一环套一环的连环套”，以便从中渔利。1986年8月上旬，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民主决议案》，呼吁国民党当局“允许人民组织反对党，停止新闻检查制度，确保言论、集会自由，朝真正的代议制制度迈进”。从此，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已成不可逆之势，国民党威权政体也行将就木。

此外，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日见成效，经济腾飞势不可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与之相反，台湾地区“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则日益萎缩，国民党当局单单依靠经济增长来维持其统治合法性的空间也在缩小。岛内的投资率从1980年以后持续滑落，从25%以上降至1986年的16.3%。本地民间资本的不投资或外流，主要是资本家对现行政治体制是否能维持政治社会秩序表示不信任。民间投资的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给国民党统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这是“迁台以来的最大挫折”，整个台湾政坛风雨飘摇，这无疑增强了台湾政治转型的推力。

三、台湾政治转型中的“蒋经国因素”

台湾政治威权转型与政治革新是历史趋势使然，是多重因素交叉作用下的结果。从客观上看，“党外势力”活动由下而上持续推动和岛内外压力与时俱增是其根本原因、根本的推动力。但是，不可否认“政治强人”蒋经国在关键时刻的抉择亦是台湾结束威权统治的重要因素，至少，因为有了蒋经国，台湾政治转型“可算是一种政治‘软着陆’”。

（一）蒋经国的痛苦抉择

众所周知，蒋经国是当时台湾“蒋氏家天下”的世袭继承人。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其职务名义是当时的“副总统”严家淦继任，但

实权却掌握在当时的“行政院长”蒋经国身上，蒋从此成为国民党当局的实际领导人。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台湾第六任“总统”。

与其父相比，蒋经国在个人民主素养、施政风格上、政治策略选择上卓然特立，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蒋介石尊崇传统文化，特别对阳明哲学和曾文正倍加推崇，崇尚专制与威权，民主观念很淡薄。蒋介石的“卧榻之侧是不容他人酣睡的”。当时岛内流传这样一则政治笑话：孙中山在天堂遇见蒋中正，问他有没有好好遵循他的民主原则轮替？蒋中正回答道：“报告总理，依照三民主义及宪法原则，各任总统如下：第二任于右任（余又任）（于右任，著名国学家、政治家）；第三任吴三连（吾三连）（吴三连，著名民报人）；第四任赵丽莲（照例连）（赵丽莲，著名外语教育家）；第五任赵元任（照原任）（赵元任，著名音乐家）。”这则政治笑话是利用谐音讥讽蒋介石及其政权世袭制。

而蒋经国早年留苏并滞留12年，受到苏联体制的影响，政治倾向进步，有一定的民主素质。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强人”而登上权力殿堂的蒋经国照样会有“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的意识，要他向“党外势力”让出政权空间，毕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特别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民党当局已被历史逼到了一个痛苦选择的十字路口，蒋经国要么强力镇压，要么开放政权，二者必居其一。理性考虑岛内外日益增长的巨大政治压力，蒋经国已经明白“镇压成本”正在与日俱增。于是，再三权衡之下，蒋经国把橄榄枝伸向了“党外势力”，毕竟“容忍成本”相对较低。正如西方学者梅沃林所言：“当威权统治者认识到维持威权统治的成本在升高，而开放民主化的成本在下降，则出现由执政精英发动的民主转型的机会将会增加。”可以说，蒋经国主导推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正是对成本“计算”后的策略选择的结果，实乃不得已的选择。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乃德这样说：“外面都说蒋经国是民主的推手，但事实上，他的改革却是在美国和人民的双重压力下，被迫采取的决定。我认为，蒋经国对台湾